

主编 王逢振

西方学术大师演讲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学术大师演讲集 / 王逢振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2

(西方学术名家丛书)

ISBN 7-201-04692-6

I. 西... II. 王... III. 文化—演说—西方国家
IV.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81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3,000

定 价: 20.00 元

前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视觉文化和流行文化正在取代传统的文化形式,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影,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正在形成一种强势文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以及以美国为主体的网络文化,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不仅融于经济,经济也融于文化。因此,20世纪后期,文化研究开始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同时在我国也开始兴起。

文化研究对传统的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不少焦虑和争论。但文化研究仍然在不断发展,甚至形成了强势。有人说,文化研究贴近当前的社会现实,具有干预社会的功能,因此应该提倡;也有人说,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时之时髦,最终要回归到文本的审美研究;还有人说,文化研究过于泛化,把一切都纳入文化研究,淹没了文学研究。可以说,兴奋和焦虑并存,争论会继续下去。

本人认为,对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应该具有综合辩证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必排斥审美研究和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的审美研究和文学研究也不必拒斥文化研究。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敌对。许多进行文化研究的人,不仅知识背景是文学研究,而且所用的方法也是文学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多种多样)。他们并不是排斥文本,也不是不细读文本,而是扩展了文本的范畴,把一切社会文化现

象都当作文本,文学文本只是其中一种特殊的文本,不论是社会文本(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文字文本(文学作品),还是艺术文本(绘画、音乐、影视、建筑等),都是他们细读和研究的对象。对这些文本,他们像对文学作品一样,都进行仔细观察、解读,并进行具体分析。那种认为文化研究脱离文本的说法,无非是指脱离传统的文学文本。其实这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因为文学文本同样是文化研究细读和研究的对象。

文化研究既是恢复人们的愿望,让边缘化的群体的文化发出应有的声音;同时又说明大众文化是一种强加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构成。一方面,文化研究联系普通人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与传统文学研究所称的文化相对;另一方面,它力图说明人们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如何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如何运用文化形式,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何受到无法控制的力量限制,等等。例如我国关于城市生活的电视剧,其中豪华的室内装饰和汽车场景等,一方面再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一种超前消费的意识形态。又如美国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一方面再现人们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把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

文化研究特别注意有争议的同性和身份问题,注意构成身份的多种方式,也注意体验身份和表达身份的方式。因此文化研究特别注意研究一些群体不稳定的文化和文化身份,例如少数民族问题、移民问题、妇女问题和社会“另类人”的问题,等等。因为这些群体难以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种中心文化认同,常常处于边缘和被歧视的地位。实际上,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的构成。

当前,文化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资料,我们编选翻译了这五本文集,包括《西方学术大师演讲集》、《西方学术大师访谈录》、《大学里的资本主义》、《消遣娱乐的文化研

究》和《静和动：影视新解》。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文化研究的现状。《演讲集》和《访谈录》既涉及文化研究也涉及文学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大学里的资本主义》重点探讨大学教育问题，包括大学商业化的问题，对我国教育具有实际的借鉴价值。《消遣娱乐的文化研究》主要收集了有关广告、通俗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文章，对这类通俗文化进行了理论阐述，提供了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和范式。《静和动：影视新解》对视觉文化和媒体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例说明。当然，仅仅五本书很难全面反映当前西方文化研究的现状，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其中的一些方面。

人们常说，严格讲翻译是不可做的。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来的某些东西，甚至会有“误解”——“误读”现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误读”，但有“肯定的误读”和“否定的误读”。我们主张“肯定的误读”：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或翻译）原作的意义。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好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象，前后左右多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至于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毫无疑问，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最后，我对天津人民出版社和藏策先生为这些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逢振

目 录

论全球化和文化	(1)
论文学的权威性	(18)
当代文化的危机	(47)
美国研究能成为区域研究吗?	(64)
传统结构下的文化研究	(102)
为批评辩护	
——为纪念加拉斯·罗伯茨及托尼·埋纳而作	
.....	(117)
元影视:后现代经济中的虚构性与大众媒体	(140)
全球感受:约翰·伯杰与经验	(175)
历史与悲剧:雅各宾时期的一个文本之中的	
性别问题	(200)
政治无意识的主体:对詹姆逊的反思	(217)

论全球化和文化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人们对全球化的讨论,常常从它的影响出发,甚至根据它的影响来对它限定,不论这些影响是好是坏。这种做法并非最好的哲学或概念讨论方式,但它使我们抓住其不同的特点,并使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对它们分类。我认为,这些影响有五种不同的形式: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

一、人们可以从纯技术方面来谈论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的是传播技术和信息革命,当然不仅是限于狭义传播意义上的创新,而且包括它们对工业生产和组织的影响,以及对商品营销的影响。大部分评论家似乎认为,全球化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卢德运动”的政治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当然也从不会采取那种旧的工业形式)。但这个主题提醒我们,在讨论全球化当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它是否不可避免?它是否可以停止或者翻过来?世界的某些部分是否可以排除它或者与它分离或切断与它的联系?显然,这一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会对我们关于全球化本身的判断产生影响——如果它确实不可避免,那么关于它的弊端或不良影响的道德判断就徒劳无益,或者至多是围绕如何改善那些不良后果来进行思考,使它们呈现最好的一面,因为无论如何它们无法避免。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这一问题。

二、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化的政治判断。这里大部分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或已经终结?

是否仍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现某种功能?关于它消亡的报道是天真的和可笑的吗?倘若如此,全球化本身又该如何?它是否只是多种对国家政府压力中的一种?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些讨论背后,潜存着一种更深层的恐惧,一种更基本的叙述思想或幻想,它们与美国本身相联系。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恐惧,即当我们谈论全球化不断扩展的权力和影响时,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当我们谈到民族—国家的削弱时,我们实际上想的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削弱,很可能它们的削弱是因为美国的权力,或者因赞成——合作或有意服从——而削弱,或者因各种残酷的力量和压力而削弱。这里在焦虑背后形成的东西,是过去所称的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本身已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体现。第一种是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殖民帝国主义,它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殖民帝国主义被取而代之,出现了一种不太明显但同样有害的帝国主义,通常采取经济封锁和威胁手段,包括派遣顾问和暗中颠覆(如在危地马拉和伊朗),这种帝国主义是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现在也许出现了第三种帝国主义,其中美国追逐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一种三重外交政策:其他任何国家不得拥有核武器,推行人权和美国式的选举民主,以及(不那么明显的)限制移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他显然忽略了第四种关键的政策,即在全球推广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帝国主义只涉及美国(和它的卫星国,如英国),包括它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各种所谓的危险地区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大多是轰炸)。这种形式是仍然被称作帝国主义,还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虚伪的、掩饰的“实际政治”?在此情况之下,当各种不同民族屈从于这些意愿时,它们失去的是什么样的民族自治?真的与殖民化时期民族自治的丧失或冷战时期强行结盟的民族自治的丧失相同?在这些条件之下(除了核力量,还有缺乏人权和民主选举,以及移民的可能性),一个主权国家真正失去的是

什么力量？

对这个问题可以作出多种非常有力的回答，但它们不再是确切的政治回答。它们可以纳入下面的文化和经济形式，但暂时我们仍尽力将它们分开。如果全球化仍然以传统的语言界定为实际是某种形式的美国帝国主义，那么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主权国家究竟会失去什么？也许是尊严和自尊；但我的论点是那些是文化问题而不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一个独立自治的政权可以使民族自尊得到满足，但那很可能只是一种奖赏和附带的利益。

或者，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后，也许我们会达到第三个令人感兴趣的主体，即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是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呢？在对帝国主义的讨论里——其中帝国主义被重新命名为文化帝国主义——毕竟总是有某种变化。诚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内部政治计划，一向诉诸于社会科学家通常所说的文化，而不是经济的自我利益，或者对权力的渴求，甚或对技术和科学成就的渴求：这些也可能是附带利益，但民族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计划，似乎诉诸于某种并非技术的东西，也不是真正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然而由于我们缺少更好的词语，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称之为文化。

不过，是否总是民族主义者抵制美国的全球化呢？美国如此认为，也想让你们这么认为，并让你们认为美国的利益反而是普遍性的。鉴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只是另一种民族主义——美国式的，是否这种抵制只是不同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某些评论家也想作出如此回答，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考察。

三、在我们谈到文化时，是否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是惟一面临危险的东西？并非如此，因为这里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其中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现在,这种恐惧确实弥漫在我们后面两个范畴之中:一方面,这明显是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美国文化工业取代的后果;同时,这种恐惧更深层的方面在于社会,而文化现在被视为惟一的征候:换言之,这种恐惧是,特定种族一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

但是,如果不看看对文化恐惧的某些反应,我们不可能转到那些经济和社会的考虑。文化恐惧大部分采取低估文化力量的形式,尤其低估文化帝国主义和支配及标准化的力量。在此意义上,通过重新使我们相信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成功并不全都那么坏,那些反应似乎是玩美国利益的游戏。因此它们需要坚持一切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顽固的力量。于是会有—种印度的身份,它顽强地抵制盎格鲁·撒克逊进口文化的力量,而这种文化的变化仍然只发生在表面。甚至可能有一种适当的欧洲文化,它永远不会真正被美国化,如此等等。永远不清楚的是,这种仿佛是“自然”的抵制,是否需要公开的对抗行为,是否需要—种对抗的政策,—种对抗和保守的政治。是不是在否认各种文化的这—自然力量时,人们是在触犯它们或侮辱它们?是不是由此隐含着印度文化太过软弱,无法抵抗西方的力量?根据过分强调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降低它所威胁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地位,是否低估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我想这是一种愚蠢的反对,而且对它最有力的回答将证明是社会的面不是文化的,我们很快会谈到这点。

无论如何,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永远不可能以那种形式来解决。—切文化政治都必然面对文化群体力量中过分的自负和对它的策略性的降低这两者之间的修辞选择。这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因此—种文化政治可以突出英雄性,体现出次等人激动人

心的英雄主义的形象——强壮的妇女，黑人英雄，法依式的对殖民化的抵抗——以此鼓励所说的公众；它也可以坚持所说公众的悲惨状况，对妇女、黑人或被殖民者的压迫。后面这些也必然会激起愤怒，使被压迫者的境遇以更容易的方式为人们了解，甚至使某些统治阶级支持他们的事业。但这里的危险是，你越是坚持悲惨和无力，在被认为是对所说群体的触犯和侮辱方面，其主体就越显得是软弱和被动的受害者，越显得容易受人支配。两种再现策略在政治著作中都是必须的，它们彼此不可能调和。也许它们对应于斗争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展现政治机遇和再现的需要。然而，除非人们以那种政治和战略的方式来考虑它们，他们就不会摆脱政治正确性中特殊的二律背反。

四、不过，我已经提出，文化问题确实倾向于分别弥散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上，经济不断地面临消失到全球化其他各层面或各方面的危险。今天，经济力量难道不是至少部分地是技术的力量，或者与新技术控制相关的力量？与此同时，尽管政治力量无疑服务于经济利益，但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也可以强化或衍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至于文化，说到底，后现代性已经具有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征。因此，一方面，商品生产现在是一种文化现象，你购买产品不仅因为它的直接价值和功能，而且因为它的形象。为了设计商品的形象和推行销售它们的战略，一种整体工业——一种经济机制——已经形成：于是在文化和经济之间广告成了基本的中介。它在各种美学生产当中无疑会受到限制，无论它的存在会使传统的美学受到怎样的质疑。色情也是这个过程重要的部分：广告宣传的策划者是真正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懂得性本能投入的必要性，懂得必须使这种投入伴随着商品并使它们吸引人。连续性也有它的作用，通过连续性，其他人的汽车或花园机械的形象会在我购买那些东西的决定中发生作用（由此也可以使我们

看到文化和经济折回到社会本身)。因此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推断,在庞大的金融市场上,我们抛出或购入股票的公司的形象也有一个文化的方面。盖·狄保德很久以前就把我们的社会描写成一个形象社会,一个以审美方式消费的景象社会。他以此表示这种将文化和经济分开的接缝,同时又将这两者连接起来,开辟指导一个融入另一个的可能。我们松散地谈到许多有关政治的物化,观念的物化,甚至感情和私人生活方面的物化;现在我们必须补充的是,今天的物化是一种美化,商品现在也以审美的方式消费。

这是从经济到文化的运动;但也存在着从文化到经济的运动,而且它同样重要。这就是娱乐业本身:美国庞大的、最赢利的出口品之一,与食品和武器等同。在重返我们前面的主题之一时,关键是要避免仅只根据文化品味来考虑文化帝国主义,例如,根据印度或阿拉伯公众对某些好莱坞的形式和主题的抵制来考虑。事实上,很容易使非美国公众对今天好莱坞典型产品的暴力、时间和身体直接性的风格形成爱好,而这些风格的声誉只能靠美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某种形象来提高。那么,这是否为西方的普遍性或至少美国的普遍性及其“文明”进行辩护?虽然是无意识地,这无疑是一个被广泛坚持的立场,因此值得认真地、以哲学的态度正视它,即使你认为它有些可笑。

但是,事实上,经济问题先于这种模糊的作为公众趣味的文化问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确保它的影片在外国市场上以压倒的优势发行:一般通过将条款写进各种条约和一揽子援助计划来实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除了坚持抵制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法国,民族电影工业在战后完全被这种约束性的协议扼杀,它们允许好莱坞逐出民族电影的生产或把它压缩到特殊化的一些方面。这种试图摧毁所谓外国文化保护主义的系统努力,只是更普遍的、

日益全球性的兼并策略(现在得到 WTO 的推崇)的组成部分,它极力以有利于美国公司的国际机制代替地方法律,不论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在专利方面无不如此(例如热带雨林资料和地方发明),更不用说蓄意暗中破坏食品的自足了。这里文化已经绝对变成了经济性的,而这种特殊的经济还明确地设定了政治日程,并支配着政治政策。显然,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相对老式的为争夺资源的斗争,例如为争夺石油和其他原料的斗争:谁敢说这些是帝国主义的现代形式,与以友好的政府(即从属的)代替抵抗的政府那些更早的纯政治的和外交的或军事的努力相同?但这好像是今天更独特的后当代和后现代的帝国主义形式——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是我一直描述的那种与一些计划相关的形式,如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销售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这并非因为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提供一种关于不加区分的教科书似的范本,说明经济、文化和政治独特的不同层面之间的汇聚融合,尽管它们是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全球化的基本构成。

但是,后者的经济方面也可以以其他多种方式表述。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方式。我们已经注意到根据更新的技术来考虑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就是技术的出口和进口,对重要信息技术的垄断和完全控制(确实,听说美国实际上控制着信息技术,其他可能的竞争者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在竞赛中失败)。我们也注意到全球化的推进可以从法律结构上来说明,这种法律结构维护并推动美国商品在海外的渗透。

现在,我们需要触及一下相关的问题,即公司和金融问题,以及文化和消费本身的问题。跨国公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被称为多国公司——是新的全球化的第一个迹象和征候,间发性地引起对可能出现某种新的双重权力的政治恐惧,或对这些跨国实体可能胜过政府的政治恐惧。这种恐惧和幻想的疯狂的一面,无疑被政府与公司商业活动(和两者之间人员交流)的

共谋所缓解——这种现象随后应引起另外不同的焦虑。特别是自由市场的雄辩者,他们总是谴责政府干预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日本模式。与此同时,新的全球合并更严重的特征是,它们能够通过把自己的活动转到海外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而破坏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还没有可比的劳动力转移的全球化与这种新发展的资本和公司的流动性相对应。

金融资本主义是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情况(它之所以成为可能也与由新技术打开的同时性相关)。这里我们要涉及的不再是劳动力或工业的流动性,而是资本本身和投资的流动性。对外国货币的思考是新的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征候,它标志着—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就是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依赖外部的资本投入(换句话说,依赖一种新的国际股票市场)。当人们说全球化不可逆转时,一般指的是第一世界以外的民族—国家绝对依赖外国资本,包括借贷、援助和投资(甚至第一世界国家也有些脆弱,例如密特朗执政初期法国社会主义政策的命运)。长期以来,大部分国家在农业方面都不能自足(至少部分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战略);但这也可以认为是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可以看作是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降低。对新的全球金融市场的依赖再不能以这些方式来解释和证明。最近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和政治领导人(例如马哈迪尔)或经济界人物(如乔治·索罗斯)的公开声明,都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新世界经济秩序破坏性的一面,它在全世界对资本的瞬间转移可以汲干国民劳动力多年生产积累的价值,使全球的某些部分整个贫困化。

美国抵制引进那种控制国际资本转移的策略,因为这种方法可能使金融和投机的破坏受到遏制。另外,美国一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保持一致,后者长期以来处于新自由主义努力的核心,以威胁撤回资本投资作为让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条件。但在这个特殊实例里,很难说美国和金融市场会绝对相互

一致:这里的焦虑与新的全球金融市场可能的变化相关,像最近科幻小说里有知觉的机器一样,它可能转变成自治的机制,造成谁都不希望的灾难,甚至最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也可能无法控制。不可逆转性自然一直是这个故事的特征:最初被视为技术的不可逆转性(不可能回到更简单的生活或更简单的生产),它也可以表述为政治上的不可逆转性,即使在这里,历史的变化也至少以抽象的方式表明,任何帝国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同样在文化上它也可以被视为对地方文化的绝对破坏,除了在迪斯尼式的虚构里,地方文化不可能复兴,就是说,只能构成人为的幻像,或者幻想化的传统和信念的意象。但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那种似乎笼罩着它公认的不可逆转性的毁灭气氛,至少部分地源于无力想象出任何可能的替代,或者无法设想“减少联系”何以首先是可行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即使相对更“缺少联系”的民族存在形式仅只几十年前还相当盛行(最明显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式)。

五、全球化经济方面的其他形式现在把我们引向最后一个层面——社会的层面:因为它假定一种“消费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在第一世界国家——首先在美国——得到发展,而现在系统地在全世界蔓延。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苏格兰社会学家莱斯利·斯科莱尔,但他并不是为了分离出一种由晚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尽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其他国家或文化的其他日常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并可以作为以特殊形式抵制目标。然而,在我看来,设定这种全球化影响的概念是合适的,即不是把它置于文化的标题之下,而是置于由经济转到社会的地方,因为所谓的消费文化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是社会结构组织的一部分,几乎不可能与它分开。这显然是在世界其他部分有时被称为西方物质主义甚或美国物质主义的东西;这里我还认为,尽管有表示其特征的语言,它仍然是特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除非在社会科学家所用的非常广

义的情况下,以世界文化表示一切传统上非社会的一科学的东西。

但是,问题并非所谓的“消费文化”是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是它是否真的不会破坏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这里的论点具有对个人主义和社会分裂的更多的传统的谴责,因为它们腐蚀和破坏更大的传统群体。公司对群体:现代非个人的社会破坏了旧的家庭、世系、村庄等“有机形式”。因此这里的论点是,消费本身是个人化的和分裂的,其逻辑是破坏日常生活的结构组织(顺便说一句,日常生活只有开始遭到破坏时,它才会被从理论、哲学和社会学上来认识)。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对商品消费的批判,与前面关于金钱的批判相似,其中恰恰是金钱被当作最具腐蚀性的破坏社会的因素。

但在这一点上,我想让全球化的一位著名的保守批评家发言。他关于破坏社会的思想确实非常深刻,他的著作会提供一个有益的文本,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化本身,而且有助于理解在全球化批判中的某些问题。这位批评家就是约翰·格雷。他的著作《虚幻的曙光》(False Dawn)追溯了在全世界不同国家境遇中全球化的影响,从俄国到东南亚,从日本到欧洲,从中国到美国,等等。在评价自由市场体制全面实施的灾难后果时,他遵循波利亚尼(《伟大的变革》)的观点,但他发展了波利亚尼的观点,提出了自由市场思想中的基本矛盾:这就是,建立完全脱离政府的自由市场,包含着大量的政府干预,并强化政府的集权力量。自由市场不会自然地发展,它必然要通过决定性的立法和其他的干预措施才能形成。这是波利亚尼所处的时代十九世纪的情况;格雷认为这正好也是我们自己时代的情况,是撒切尔在英国试验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他还补充了一种反讽的辩证的扭曲:就自由市场破坏既定的社会群体而言,就撒切尔的保守党的追随者本身就是这种群体的保守的“人民阵线”而言,她的自由市场实验的

成功破坏了它的(和她自己的)选举人的基础,不仅在那些因之贫困化的人当中造成巨大不利,而且还分裂了从一开始就支持她的那些非常保守的群体。格雷从这种辩证的颠倒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他自己的)与自由市场政策的干预主义是不相容的;第二,民主本身与自由市场的政策也是不相容的,因为大多数人必然反对其招致贫困和破坏的后果。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力的资料,对许多关于全球化的修辞和美国的自由市场是副绝好的解毒剂;实际上,正是这种修辞或新保守主义理论,构成了格雷著作中基本的意识形态目标,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今天世界上的灾难性变化,那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一种积极的具有塑造力的影响。新保守主义是一个计划,实际上,人们几乎可以说它是一种共谋,在这种意义上,格雷表现出对观念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极大关切,他认为这种力量胜过政治发展和经济组织,更莫说文化和社会了。

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作为“坏的”或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动力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美国现象。撒彻尔夫人可能最早提出了这种意识形态,但在发展过程中她本人破坏了它,也破坏了英国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问题是,被美国的普遍主义(在“西方文明”的掩饰下)所强化的美国信条,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得不到共鸣。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仍然流行之际,格雷提醒我们欧洲大陆(甚至英国)的传统决不欢迎这种绝对的自由市场价值,尽管它们体现了他所说的“社会市场”或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的文化。然而,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东南亚和俄国的文化,也都不欢迎这种新保守主义的乌托邦,虽然美国如果成功地通过武力、贿赂、威胁或说服将它移植到那里也有可能摧毁那些文化。在这一点上,格雷回到了两种标准的社会科学概念:文化传统和现代性。

现代性是第二个需要讨论关键的术语。下面我引用格雷的原话: